

1

何 帆

传统计划体制的起源、演进和衰落

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在建国之初几乎是不约而同地都选择了计划经济体制？为什么这种体制当年能给社会主义国家带来令人瞩目的经济高速增长？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在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又都遇到了种种经济难题，早年的经济增长势头忽然间难以为继？所有这些谜一样的问题，围绕着计划体制在人类历史上奇迹般地现身，它雄心勃勃地创新和不幸遇到的种种挫折，仍然留待人们去不断反思。这篇文章试图对这些问题作些尝试性的解释。本文所关心的问题包括：(1) 计划体制在中国的起源；(2) 计划体制和市场经济在时间进程中的不同绩效；(3) 传统计划体制的衰落。

一、计划体制在中国的起源

研究计划体制的学者们普遍认为，相对于社会主义的历史实践而言，经典作家的原始构思对各国社会主义的具体形成影响甚微（伯林纳，1966）。在我看来，计划体制在中国的起源，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意志的体现。

首先，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远远长于新中国的历史，因此，共产党长期征战中形成的战时命令体制就不会不对新中国的计划体制产生深远的影响。从历史渊源上说，1940年之后形成的以陕甘宁边区最富代表性的抗日根据地体制，对中国计划体制的起源尤其有着直接的影响。相比起来与其说是舶来的“苏联模式”决定了中国计划体制的面貌，倒不如说这种土生土长的“延安模式”才是计划体制的胚胎。这种模式的特点一是统收统支；二是地方分权，即各根据地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实行分散经营、自力更生。在面临着严峻战争考验的时期，这种模式曾经有效地保障了战时供给，保证了共产党能够最终顺利地夺取政权。到建国之后，一方面由于四边战火犹未平息，政权尚未稳定，所以这种战时体制自然仍有其用武之地；另一方面，对于初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新政权赖以巩固和发展的庞大的中层干部大多行伍出身，他们熟悉的是以命令和服从命令为特征的军事组织。可见，面对这样一种丰厚的组织资源，最合理的利用途径恐怕就是“命令式”的计划体制（张宇燕，1995）因此，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经济体制在建国伊始，就已经有了鲜明的“中国特色”。

其次，新中国的领导人在建国之初便确立了以赶超西方发达国家为目标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而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国通过国家力量强制实行工业化，其结果只能是导致计划经济体制。林毅夫等作者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和经济改革》（1994）一书中较为清晰地解释了这一内在的经济逻辑。他们的理由大致如下：首先，在一个发展水平甚低、资本极度缺乏的国家内优先发展重工业，只能人为地压低资本、外汇、能源、原材料、劳动力和生产必需品以降低重工业资本形成的门槛，因此造成了生产要素和产品价格的极大扭曲；其次，由于市场机制很难保证稀缺资源流向不具比较优势的重工业部门，因此就需要借助计划与行政命令配置资源；最后，为了贯彻资源的计划配置机制，在微观上必须建立以完成计划任务为目标的国有企业和人民公社。可见，一经选择了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目标的赶超战略，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高度集中的资源配置制度和没有自主性的微观经营机制便相继形成，这种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制是内生的，是相互依存、互为条件的。

最后，社会主义国家除了普遍追求经济增长率之外，充分就业也是其最关心的国家目标之一。从一开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和公民之间就存在着一种隐含的“社会契约”：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义理性（legitimacy 又译合法性 既然来自“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则国家无形之中便负有提供公民“劳动和工作的权利”的义务。正如我们现在已经认识到的，如果由市场经济自发调节劳动力市场，则自愿和非自愿的失业是不可避免的。为了实现工人全部就业的目标，社会主义国家只能借助计划体制。在计划体制下依靠行政命令实现充分就业，结果只能是压低并限制工资水平。但作为对此的补偿，国家还会给予工人较高的福利待遇。国有企业实际上承担着提供各种福利待遇的任务，这就是“企业办社会”这种现象的来源 张宇燕 何帆 ,1996)。

二、两种体制在时间进程中的不同绩效

如何比较计划体制和市场经济在时间进程中的不同绩效？一般来说，衡量一国经济绩效的主要指标有两个，一是看其人均国民收入的水平，二是看其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率。然而，这两个指标都有着很大的偏颇性。如果仅仅是看人均国民收入的水平，则发达国家挟其数百年来之深厚积累，自然比后进国家占据优势；反之，如果仅仅是看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率，则落后国家由于基数小，起点低，其潜在的增长机会要比发达国家更多，反映在增长率上自然比发达国家更高。

美国马里兰大学的两位经济学家默瑞尔教授和奥尔森教授（Murrell, Olson, 1990）指出，为更加准确地衡量一国经济的真实绩效，需要考虑其实际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和潜在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的差距。换言之，良好的经济绩效意味着一国能尽可能地挖掘该国经济增长的潜在能力，缩小其实际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和潜在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的差距。

根据默瑞尔和奥尔森的研究，计划体制国家和市场经济国家在1950~1965年、1965~1980年这两个时期的经济绩效如下：

表 1 计划体制国家和市场经济国家 1950~1965 年间的经济绩效比较 (单位:%)

	实际增长率(1)	潜在增长率(2)	增长率差距(2)-(1)
市场经济国家	3.75	5.49	1.74
计划体制国家	4.43	6.05	1.62

资料来源 Murrell and Olson, 1990.

表 2 计划体制国家和市场经济国家 1965~1980 年间的经济绩效比较 (单位:%)

	实际增长率(1)	潜在增长率(2)	增长率差距(2)-(1)
市场经济国家	3.36	5.13	1.76
计划体制国家	3.24	5.71	2.48

资料来源 :Murrell and Olson, 1990.

上面两个表中,第二栏分别是计划体制国家和市场经济国家在 1950~1965 年、1965~1980 年这两个时期内实现的年均实际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第三栏是这两类国家在这两个时期按照预测应实现的年均潜在人均国收入增长率。第四栏是这两类国家在这两个时期实际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和潜在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的差距。

从这两个表中可以看出:(1)在 1950~1965 年间,计划体制国家和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绩效大体相当,计划体制国家甚至表现出来了一定的优势。这表明在建国初期,社会主义国家的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其经济体制中的其他缺陷;(2)在 1965~1980 年间,计划体制国家的经济绩效开始明显落后于市场经济国家。虽然从表象上看,计划体制国家的实际增长率与市场经济国家相差并不大,但分析它们的增长率差距就可以看出,计划体制国家已经开始衰落:在 1965~1980 年间,市场经济国家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和潜在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的差距(1.76%)和上一时间(1.74%)相比基本相同,但计划体制国家的增长率差距已经从上期的 1.62% 扩大到 2.48%。换言之,市场经济国家的增长率差距仅扩大了 2%,而计划体制国家则扩大了 86%。

考虑到资本主义国家在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经历的是历史

上前所未有的“黄金时期”，则社会主义国家在建国初期能够实现与之并驾齐驱的高速增长，不能不令人震撼。以往研究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历史的经济学家大多只注意到了这些国家普遍存在的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默瑞尔教授和奥尔森教授则进一步地分析了这种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的由来。

在默瑞尔教授和奥尔森教授看来，计划体制国家与市场经济国家的最大差异在于，计划体制国家实行的都是一种相对集权的政治制度。在计划体制国家中，治理国家的权力集中在少数国家最高领导人手中，而且，由于这些领导人可以长期任职，因此其集团比较稳定。和其他公共选择学派的理论家们一样，默瑞尔和奥尔森也把治国者视为“经济人”也就是说，身居高位的治国者和芸芸众生一样，也是在约束条件下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治国者最关心的莫过于其政权的长治久安，或者说，治国者的目标函数可以概括为义理性的最大化。由于在计划体制国家中，权力相对集中且统治稳定，所以其治国者的自身利益自然而然地易于和整个国家的兴衰荣辱紧密相连。与所谓民主政体中那些轮流坐庄的政客相比，计划体制国家的领导人更为关心自己国家的经济增长。

这种关心首先体现在治国者对经济增长率的渴求上。由于在敌对意识形态国家的包围之中明显感到的生存威胁，由于一国的经济实力（主要是工业力量、科技力量和军事力量而非消费者的福利水平）直接决定它在国际上的影响和地位，由于更高的增长率在两种制度的竞争中可以提高自身意识形态的感召力，所以不难理解，社会主义国家几乎都以“赶超战略”为基本政策。

相对集权的政治体制不仅赋予了治国者强烈的动机去关心经济增长，而且这种体制还给治国者实现自己的雄心壮志提供了有利条件。首先，强有力的集权政府可以轻易地粉碎各种利益集团对经济增长的干扰。奥尔森在《国家兴衰探源》（1982）一书中指出，寻求特殊利益的各种组织或集团过于活跃时，将会降低社会效率和国民收入，而且还会带来政治不稳定因素。利益集团追求的往往是瓜分更多社会财富。奥尔森形象地把这些既得利益集团之间的竞争比作一群人在瓷器店里争夺瓷

器：一部分人在多拿的同时，还会打破许多大家本可以分到手的瓷器。其次，由于长期任职，治国者可以有足够长远的眼光去进行长期投资，比如科技、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等等，而这将在一定程度上为日后的经济成长奠定基础。

三、传统计划体制的衰落

在经历了建国之初的经济跃进之后，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日益暴露出效率低下的问题。事实上，经济学家们目前普遍认为计划体制先天就有着致命的缺陷。因此，出乎意料的可能并不是这种体制为什么会在 20 世纪末宣告结束，而是它为什么竟会存在将近一个世纪之久。

任何一种经济体制的优劣，都取决于其内在的信息机制和激励机制。信息机制关心的是经济体制的运行成本，即如何以较少的关于消费者、生产者和经济系统中的其他参与者的信息，维持一种经济体制的运行。激励机制关心的是人们的积极性，即如何使每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结果，能够符合社会的需要和目标。从信息机制这一方面来讲，计划体制要求中央计划者处理瞬息万变、浩如烟海的有关消费者和生产者的信息。在信息的层层传递过程中，信息量将呈几何级数递增，最终远远超出了计划者信息处理能力的极限。这使得有的批评者称计划体制只是一种“计算机乌托邦”。再从激励机制这方面来看，由于国家只能以执行计划的结果评价工厂和企业的业绩，所以完成计划目标便成了各级经营者惟一关心的事情。于是，就像一幅漫画所讽刺的那样，在一辆卡车上装着一颗直径两米左右的大铁钉，旁边的工人们高兴地说：“我们超额完成任务了。”直径两米的大铁钉在实际生活中虽然毫无用处，但它却能满足生产的计划指标。更糟糕的是，由于国家只能以经营者过去的工作成绩制定下期计划任务，所以经营者为了逃避更多的生产任务，有着强烈的动机去隐瞒其真实产量，甚至消极怠工。

这种有着先天缺陷的计划体制之所以还能够长期存在，恐怕是因为：(1)相对集权的政治体制提供了一种针对治国者的激励机制，使之格外关心本国的经济成长；(2)在未能达成合谋之前，下级官员以及经

营者的相互竞争有助于减少国家的监督成本。换言之，这种内部竞争减少了计划体制所需要的信息量。

以上两点合起来实际上说的是一件事：计划体制在其初期因为有效地抑制了“分利集团”的活动而实现了不同寻常的高速经济增长。遗憾的是，以上两个方面的因素似乎只是暂时的、特殊的。考虑到计划体制国家的建国大多经历了革命、战争和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动，我们就会意识到，这些激烈的震荡已经替新生的计划体制国家清洗了社会中旧有的利益集团。

经过一段相对稳定的历史时期之后，新的利益集团开始在计划体制内部逐渐产生。尤其是，在主管各部门的高中级干部和下属企业的领导人之间，有着天然的共同利益基础，最容易形成共谋。

这确实是官僚体制的两难。一方面，从提高政府效率的角度来看，有必要在政府内部实行按部门的分工，主管领导和下属企业领导保持紧密联系也是促成上下级更好合作必不可少的。但另一方面，由于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信息不对称的永恒难题，当作为治国者的代理人的主管领导和下属企业领导形成共谋之后，“是的大臣”这种“被治者左右治理者”（the regulated becoming to dominate the regulators）的尴尬处境便不可避免了。人们常把各部门里主管领导和下属企业领导形成结盟之后的活动称为“官僚主义行为”。仔细分析这种官僚主义行为指两件事：一是尽量向中央隐瞒本部门的实际生产能力；二是尽量向中央索取更多的资源以供自己支配。由于处于下级的部门联盟在信息方面比中央具有优势，也就是说，各部门的事情各部门自己最清楚，中央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往往只能听信这种虚假的汇报。

在部门结盟的势力不断巩固、壮大的同时，是治国者瓦解“分利集团”能力的削弱。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没有外力干扰的情况下，新一代政治领导人几乎都是从部门官僚中产生的。而且，官僚阶层在政治决策过程中将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于是，治国者在与利益集团谈判时的地位和力量自然不如以前。部门结盟在计划体制之下是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也是市场取向改革的最大阻力。部门结盟在寻求特殊利益的过程中，逐渐侵蚀着计划体制的基石。于是在计划体制后期，经济增长

缓慢的趋势便不可避免地出现了。

结论是：计划体制初期的经济增长应归功于当时这种体制能有效地抑制利益集团活动；计划体制后期的经济停滞也应归咎于体制内部的利益集团损害了经济增长。

最后需要提醒读者的是，当我们把这个理论应用于中国的现实时，至少需要注意国情的两点特殊性：

1. 即使是在传统计划体制时期，中国的计划控制程度也远没有前苏联那样严密。建国之后，中国最初曾经学习苏联模式，即由中央计划部门领导按职能划分各部委，而各部委负责监督按行业归属的各国企业的生产活动。实践证明，在仍处在农业为主的发展阶段、且各地区差异悬殊的大国，实施这种体制的组织管理费用非常高昂。从 1958 年起中国开始偏离苏联体制进行自己的实践。这主要是指中央政府按行政性分权的方式，按地区行政划分层层下放自主权。这种地区性分权减少了原有体制下处理的信息数量，使管理费用得到下降。分权也使地区间的横向联系和竞争得到加强。这可能正是中国能够在阻力不太大的条件下发动并推动改革，从而创造了 20 世纪 80 年代经济增长奇迹的原因之一。

2. 毛泽东同志对计划体制内部的官员结盟有着一种极为强烈的警惕。他对技术官僚的排斥以及反复提到“掺沙子”、“挖墙角”等可能就是出于伟大政治家对利益集团危害性的本能的警觉。但是，毛泽东同志当时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比如错误地发动“文化大革命”在破坏了计划体制内部结盟的同时，也妨碍了政府机制的有效运转。物极必反，这种反对“分利集团”活动的方式不仅未能实现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反而几乎导致了国民经济的崩溃。

2

周天勇

为什么要建立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传统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对传统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一次否定。自 1949 年 10 月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在 20 世纪 50 年代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后，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一个国家，无论它是社会主义制度，还是资本主义制度，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其经济运行和发展，关键是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经济活动的活力和效率，包括劳动者工作的努力和勤奋，技术创新和进步，劳动者之间和企业之间的竞争，各种要素使用的产出效率等等，这决定一个国家增长的动力；二是经济运行和发展，包括一系列结构创新中的平衡、均衡和稳定，需要注意的是经济结构的创新，即创新需要一定的不平衡、不均衡和不稳定 但是 这种不平衡、不均衡和不稳定过分 则会因震荡过度而破坏经济的运行和增长；这些平衡、均衡和稳定包括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产业结构、消费结构等在创新过程中的均衡，经济的稳定增长和经济增长有一个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等等。

一、计划经济为什么要转向市场经济

1994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市场经济既不姓资，也不姓社，而是社会化大生产配置资源的一种方式，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要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

20世纪40~50年代，主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前后的期间，出现了一系列崭新的科学技术和有关理论。它们是：电子计算机、控制论、信息论、系统工程、运筹学、投入产出平衡等。这些科学技术的成果首先被运用于军事领域和工程领域，如控制论在二次大战中被应用于自动高射炮的研制中。而后，它们又被扩展到生产领域和大型工程项目的组织管理中。因此东欧经济学家兰格据此写了《计算机与社会主义》一书，通过计算机的价格试错，求解千千万万个联立方程，中央计划机关就可能有计划按比例地分配资源^①。

现在看来，兰格的中央集权的有计划的市场经济模式，建立在一系列暗含的假设之上：假设信息费用为零，取得信息是无代价的，从各行业、各地区、各企业和各消费者手中获得信息不需要成本；假设计划过程即计划制定、下达、实施、反馈等过程也不需要成本，假设计划的制定、下达、执行、反馈等各方及各计划执行者之间的利益是高度一致的，计划的纵向和横向之间没有利益上的矛盾；计划人员是非常有理性的，其知识全面、经验丰富，能先知先觉，预测未来，计划人员犯错误的可能较小。

这些假设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不成立的。首先，获得信息要付出代价，并且需要时间，还要辨别信息的真伪。与计划经济相适应，需要建立庞大的经济体系，统计人员和机构一直要延伸到企业和其他经济活动单位之中，这些人员需要开支。信息统计的时间有一个过程，包括样本记录、逐级汇总，直到集中。有一些信息，等这样一个过程完成后，其发布对企业的生产用处不大，甚至发生负作用，因为社会需要的变化太快，根据采集样本时的统计信息来指导生产，已经不适应变化了的对生

产的需求。更重要的是，在传统的社会主义行政体制中，往往由于生产者考虑个人的政治升迁、横向的攀比、部门和地区的利益，扩大生产成果、缩小利润、夸大损失等等伪信息较多。根据这些伪信息制定农业生产计划或发生粮食短缺或出现粮食过剩制定生产投资计划或发生重复建设，或发生对投资者无利的一些供给的严重缺乏。

其次制定、下达、执行和反馈计划也是需要成本的。而且比市场调节成本高得多。严密的计划经济体制，需要庞大的计划制定和发布机构，要有层层和各部门的计划机构，在各企业之中要有与之相关的计划处室。因此，计划经济设想实施的结果与马克思另一国家逐渐消亡的设想正好相反，国家越来越被强化。这种成体系的庞大的计划体系，需要巨大的办公开支，其人员需要大量的工资及住房等费用。而且计划制定和协商过程也需要大量的成本比如开会、文件、差旅、招待、邮电等等费用。计划的制定、下达和执行需要时间，社会资源在计划的制定、协商、下达、执行等过程中周转速度缓慢社会劳动时间延长（类似资金利息式的）时间成本加大；而由于计划的周期长，往往社会需求在计划制定时期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信息统计的反馈在一个统计和计划体系的国家里非常迟缓，根据制定的计划进行的生产和投资决策，形成的供给结构常常与社会的需要结构有很大的差异，导致社会资源配置的浪费。这就是计划的另一时间滞后性成本。

再次，计划研究者、制定者、层层下达者、执行者、反馈者等等之间的利益并不是高度一致的。一是计划体系是由各方工作者组成的系统，而每个工作者有他自身的利益，他的利益与整个计划体制的利益并不是一致的。特别是计划制定和下达者，往往有很大的资源配置权力，资源分配的多少、好坏、及时与否项目审批的时间、额度等等可以极大地影响计划执行者的利益。因此，计划执行者为了在争取计划（资源和审批）时时间最短、成本最低、资源获得最多常常想尽一切办法来满足计划控制和下达者的个人的利益；而计划制定和下达者又利用制定、审批等权力来寻租。最后，并不能使计划的制定和下达，真正能按经济需要和比例进行。二是中央计划机关与部门及地区和企业之间，在利益上也并不是高度一致的。就各计划机关来说，本身也有一个小机关利

益。对用各种方式交租金多的，分配资源也多、好和快；对所交租金少的，分配资源则无、少、差和慢。而要求计划需要资源和审批的部门、地区和企业，往往为了多得资源，夸大所需资源的数量，谎报需要的资源的必要性，再通过不正当的手段，获得资源，使资源可能配置在不当的行业、地区和企业之中。

第四，计划人员的理性是非常有限的。计划人员不可能有无所不包的全面的知识，而一个审批项目在现代社会中，其外部联系和内部结构越来越复杂，涉及到许多方面，一个计划制定和审批者，需要有各种工程技术方面的知识，要有财务、市场、风险等方面的知识，还能预测未来。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而由于过去和目前公务员和官员体制所限，关系、论资排辈、稳定等因素可能使许多知识面有限、能力较低的人员处在计划制定、决策和审批的岗位上。许多计划人员根本不知道怎样调查需求、降低成本、避免风险。这样的计划人员制定、下达和决策的计划，本身可能就有许多错误。再加上个人利益决定的寻租动机，使计划的失误很多、时间很长、成本很高。实际上，目前许多亏损、报废和不应该建设的项目和企业，绝大部分都出自各级计划机关。而且，由于没有产权关系，决策失误风险和责任都与计划机关无关。计划人员非常有限的理性，其个人的利益，再加上决策无风险和责任体制，使社会主义最大的浪费和损失发端与来自于各级计划机关。

以上就是国家社会主义模式下的计划经济体制为什么要退出社会主义历史舞台和市场经济体制融入社会主义经济的根本原因。社会主义要用市场经济模式来谋求资源配置的均衡和资源配置的有效性。

二、国有经济为什么要进行战略性的调整

以上我们探讨了社会主义的经济计算和资源按计算配置的问题，结果计划计算和配置最终让位于市场求解需求和调节资源配置。那么，怎样解决社会主义经济的动力呢？按照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设计，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这也是计划经济的一个基础），让劳动者占有生产资料；在社会主义阶段按劳分配，多劳多得。通过劳动者直接占有和

使用生产资料，当家做主，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从而寻求和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的动力来源体制。实践证明，这种体制也存在着严重的缺陷。我们这里先来看全民所有制。

1. 全民所有与国有经济

全民所有制，在社会的财产制度上是指全体人民占有生产资料。理论上具体为，企业的资产属于全体人民所有，全体人民选出人民代表，组成人民代表大会，组成国家（包括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政府、法院、检察院等）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政府并委托政府行使所有权和管理人民所有制企业的权力。如往企业派领导，向企业收取利润，决定企业技术改造、生产计划和投资项目等等。另外，中国共产党是工人和农民阶级的先锋队组织，代表人民的利益，是执政党，领导政府进行经济建设和管理工作。因此，中国共产党组织也代表人民的利益行使一部分所有者的权力，即向企业委派领导，并管理国有企业的干部。因此，实际上所有制结构中的委托代理关系和成分较为复杂，政府是摸得着的，但其机构中没有承担责任和风险的所有者。全民所有制是一个较抽象的概念，如果取一个适中和贴切的定义，将其看成是国家所有经济，即国有经济较为准确。因此，从对社会主义理想的传统理解看，国有经济的比重越高，这个国家的经济制度越具有社会主义性质。

实际上，在生产水平比较低下的情况下，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和目前的国有经济看，国有经济分配公平和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初衷在某种程度上被扭曲了。首先，新中国成立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国有经济的相当一部分资本是通过不合理的农业产品与工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积累的，农民实际上并没有这部分由价格不合理积累的全民资产的所有权，这不仅与社会主义原则相悖，也不符合等价交换的市场经济原则。其次，相当长的时间里严格的户籍制度划分了城市市民与农村农民的社会身份，职工也因所处的单位不同，划分为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和集体所有制单位职工。按照这种制度，农民不能在全民的企业中就业，甚至不能在城市的企业中就业。集体所有制单位的职工，不能流动到全民所有制单位就业。这样就限制了农民和集体所有制劳动者分享国有经济成果的权力。再次，国有经济的社会福利效应绝大部分扩散在

城市之中，比如从国有企业征集的各类社会保障，其支出范围主要在城镇之中，城市的市民是国有经济扩散福利的享受者，而农村的农民则享受不到这种全民的福利。第四，就是在国有经济内部，一些垄断性的国有行业，其工资水平要远高于非垄断性的行业，这种收入上的差别并不是由于劳动行为和经营管理上的差别造成的，并且一些年中许多垄断性的国有行业社会保障还实行行业内统筹，一些城镇集体企业和广大的农村还不能参加全社会的保障，社会保障的全社会统一性原则都没有做到。因此，我们传统和目前的国有经济，并非一种真正的社会主义全民意义上的经济，而是一种非常不合格的全民所有制经济，只能被称作是一种国家社会主义经济。

我们且不论以上这些不合理之处，在实际生活中，国有经济能不能运行下去，取决于它的效率和对国民经济运行和成长的贡献。如果它的效率很高，动力很足，并且有持续和很强的活力和竞争力，即使它在一些方面存在着不合理性，也可以通过对其税收和财政的转移支付解决城市与乡村集体与国有之间的利益差距问题，而保留和发展一个规模庞大的国有经济。

但是，从改革开放以前和以来的实践看，国有经济总体上效率持续下滑，国有工业每百元资金税后利润率从 1978 年的 15.5% 下降到 1998 年的几乎为零，其运行和发展本身有它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

2. 费用高昂和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产权结构

从产权关系看，国有经济没有一个真正的产权主体，从全体人民所有到国有财产的管理和经营，都包含了太多委托代理关系，如全国人民、全体党员、人民代表、党员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党的代表大会、中共中央、国务院、组织部、人事部、各部、各地方党委、各地方政府、各厅局、各厅局党委和党组、企业。全民所有制到企业是一个很长和几重的委托代理关系。从代表国家行使所有权的机构来看，计委行使国有经济的决策权，经贸委行使国有企业的技术改造权，组织部门和人事部门行使国有经济的人事权，财政和国资部门行使国有经济的资产和财务管理权，产业管理部门行使具有管理企业的权力……于是，所有者被模糊和分割了。虽然有一个庞大的企业管理体系，在这里却找不到行使所

有者人事权、决策权、财务权等权力后面对应的风险和责任的具体承担者。一个社会，如果体制上许多机构只有决策和管理的权力，而没有对应的责任，没有所拥有权力的风险，没有义务，发生重大浪费和巨额损失的情况是不可避免的。

从国有企业的内部组织结构看，千千万万个国有企业，实际是千千万万个级别不等的党政社团组织，企业领导干部实际是千千万万个党政社团干部。企业领导和企业中的科室是为上一级的领导和党政社团管理部门负责的。特别是企业领导的命运取决于有关的组织人事部门，而不决定于企业本身的盈利状况。由于千千万万个国有企业的领导是由人事组织部门选任的，暗含的一个假设就是，他们如同上面所述的计划部门的计划人员一样，也有完全的理性，是有各方面的知识，具备能窥透企业干部本质的能力，有预见企业领导人未来道德品质变动的先知。但是，他们如同计划部门的计划决策者一样，对用人带来的企业经营亏损和风险不负任何责任。实际上，少数组织人事部门的干部也发生了通过用人权力寻租的情况。这就使得所用的国有企业领导干部的知识、能力大打折扣。

而企业内部的领导成员构成，不是按照现代企业领导形式组织起来的。党组织要参与重大决策与企业经营管理系统并存，有时存在着两个平行的指挥系统。甚至两个平行系统领导的副职也是上级组织人事部门任命的，他们都向任命他们的上级组织人事部门负责，使一把手对副职的领导能力也大打折扣。据说，像宝钢这样的企业，其领导干部需要由中央和地方的几个部门来考核和任命。在国有企业内部形成一种摩擦和内耗的领导结构。企业内部两个平行的系统，加上外部党政社团组织机构向国有企业的延伸，使得企业的内部和外部体制成本很高。

国有企业主要经营管理者知识、能力并不作为能参与分配的一种要素来看待。其工资报酬是国家参照同级的公务员工资水平上下略有浮动规定的。于是，一些国有企业领导的报酬水平远低于经营规模较小的其他经济体制企业经营者的报酬，甚至低于其他经济企业员工的工资报酬。这一方面使得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受到影响，心理发生不平衡；另一方面，有少数国

有企业领导，通过各种方式，化公为私，转移国有资产。

实际的国有经济运行中，企业内部控制的现象也很严重。因为出资者多头，而且没有责任，出资者的监督也不到位，某些企业领导人化公为私、假报利润、虚报亏损 各种情况 应有尽有。一些企业表面上轰轰烈烈，过几年后，国家眼睁睁地看着其债台高筑、资不抵债、濒于破产 而无法监控。

企业由国家所有和管理，还是由社会所有和管理，其监督管理成本是不一样的。以上所述表明传统的国家管理国有企业的体制，其监督管理费用太高，而且效果极差。而企业社会所有，自我管理，从体制上讲节省了一块非常庞大的上层建筑开支，降低了企业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协调成本，并且党和政府所要负的亏损和风险的 责任也要小得多。

3. 冗员和失业：国有经济必须收缩的结构原因

国有经济到底占多大比重，抉择并不取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社会主义的设想，也不取决于我们对于社会主义的美好理想和传统理解，而决定于来自实践并无法回避的这样两个制约：一是国家财政收入实力能给多大规模的国有经济注资，二是国有经济提供多少就业机会和有 多大比重的就业容量。这里我们来分析第二个制约。

从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趋势看，要素收益有规则的变化是任何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都发生作用的规律，资本收益下降和人力收益率上升并没有其阶级性。如果社会主义国家不按照要素变化规律的要求进行经济结构和体制的调整，必然也要受到要素收益变化经济规律的惩罚。在资本收益率下降、劳动者收益率上升的情况下，工业资本有机构成有一个长期的资本与劳动者比例提高的趋势，即资本相对和绝对规模越来越大，而劳动者的相对或者绝对数量则越来越少，即减人增效。

目前我国下岗没能再就业的不在统计之列的职工达 1 000 余万，统计失业人员达近 600 余万，就业压力非常之大，就业形势是建国以来最严峻的，也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相比的。就每年的就业形势看，进入就业年龄期的新增劳动力较多，仅城镇本身自 1999~2009 年将新增 4 000 余万劳动力，每年需要安排就业 400 万人。农村向城镇需要转移 1 亿多的剩余劳动力（即使这样农业中还将剩余劳动力 1.5 亿

之巨)按照城市化和工业化的需要,农村人口城市化是一个世界性的规律,没有一个国家能违反这个规律而将农民永远固定在他们的土地上,违背规律的做法都程度不同地受到了客观规律的惩罚;但是,这里并不否认农村经济的良性发展,可以在一定的时期内延缓城市化的速度,缓解城市的就业压力)每年需要向城镇转移 1 000 余万人。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积累了至少 3 000 余万的富余职工。经济发展是阶段性的,产业结构也要随着阶段的不同而变化,将不时地有相关的企业缩小、转产和破产,其职工也要进行结构性的调整,从而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但是,由于传统国有经济体制下,企业只生不死、职工不能流动等种种原因,目前在企业中积累了结构性剩余的劳动力约在 1 000 万人左右。两项相加,每年需要再就业的压力为 300 万人。因此,世纪之交的 10 年期间,因新增城镇劳动力、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和产业结构变动挤出形成的就业和再就业压力平均每年为 1 700 万人。

如此多的新增劳动力需要就业,如此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如此多的职工需要再就业,国有经济根本无法全部包下来。就近几年来看,国有经济不但不能吸收劳动力就业,还要减人增效。国有经济是资本有机构成较高的企业,资本和劳动比很高,安置一个劳动力就业需要的投资很大,按照经验计算的盈利的资本有机构成,需要 40 万元。如果将每年需要就业的 1 700 万人全部安置在国有经济单位中,年投资最少也需要 68 000 亿元,这是一个天文数字,是国家财政根本不可能办得到的事情。我们无法在理论和理想上谈论国有经济应当占有较高比重时,不考虑现实中令人忧心的、相当多公民的就业、吃饭和安定问题。

近几年,国有经济产出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持续下降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国有资本收益率不断下降,人力收益持续提高,人力收益实际就是国民生产总值的一部分,越来越多的人如果不能在资本有机构成较高的国有企业中就业,纯国有经济的净产出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毫无疑问,必定会下降。这是一个无法抗拒的必然趋势。

国家财力薄弱,不能向如此大规模的国有经济注资,就业压力大,农业过剩劳动力太多,资本有机构成逐步提高的国有经济不可能包揽全部